



傅雷翻译研究

许钧 宋学智 胡安江 著

译林出版社



博雷翻译研究

藏书

许钧 宋学智 胡安江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翻译研究 / 许钧, 宋学智, 胡安江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447-5789-8

I. ①傅… II. ①许… ②宋… ③胡… III. ①翻译理论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0704号

书 名	傅雷翻译研究
作 者	许钧 宋学智 胡安江
责任编辑	韩继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37千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789-8
定 价	3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傅雷翻译研究”（项目编号：BYY008）
之研究成果

谨以此书纪念傅雷逝世五十周年

前言

在2008年举办的“‘我心中的傅雷’——纪念傅雷诞辰一百周年征文”大赛中，作家韩曜的参赛文章《我心中的傅雷》曾这样写道：“傅雷，一直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文，他以火热的心拥抱生活中的美好，以冷峻的眼去睥睨现实中的丑恶。在他的书卷间、行文里流淌的是屈原式的洒脱神奇，是杜甫式的忧患常袭。”他还认为，“纯真得像孩子，虔诚得像教徒，比象牙还缺少杂质的傅雷先生留给我们的是孩子的微笑，大师的背影”。显而易见，韩曜这里所谓的“孩子的微笑”指的是傅雷“为人”的至真至诚，而“大师的背影”则指傅雷“为译”的至善至美。事实上，我们今天缅怀傅雷、研究傅雷，感动和温暖我们的依然是傅雷“为人”“为译”的那种纯粹与执着。

目前，关于傅雷的研究专论，主要以描述其生平的传记性文字为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金梅的《傅雷传》，生动真实地描写与再现了傅雷的身世际遇以及人生轶事；谢天振、李小均的《傅雷：那远逝的雷火灵魂》，简明勾勒了傅雷的传奇人生、思想风貌、翻译美学与艺术成就；傅敏与陈小明编著的《孤独狮子》，则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傅雷形象——寂寞孤独、愤慨高傲、遗世而独立；叶凯的《傅雷的最后17年》，分九章描述了傅雷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生；而叶永烈的傅雷研究系列专著《傅雷画传》《铁骨傅雷》《解读傅雷一家》以及《傅雷与傅聪》，更是从不同的艺术视角与人生截面，详尽探讨并深情回顾了傅雷的艺术人生与传世家书，其中不乏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傅雷研究资料；此外，2008年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辑的《洁白的丰碑：傅雷百年诞辰纪念》，则以图影和文字搭配的独特方式，通过傅雷的少年时代、留法的青年时代、留法归国年代、傅雷的壮年时代、一九四九年后的传奇、傅雷的摄影作品与傅雷身后的影响等七部分内容，概略性地向中外读者介绍了傅雷的一生及其翻译成就；此外，苏立群的《傅雷别传》以及段文菡的《艺海清辉——傅雷》，则补遗性地探讨了傅雷的译者人生与艺术情怀。

除了这些传记性的文字之外，另有部分专论则主要围绕傅雷广博精深的艺术素养展开研究与论述。其中较具影响力的著作包括：金梅的《理想的艺术境界》，从“论修养”“论美术”“论音乐”和“论文学”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傅雷的文艺修养；程帆主编的《我听傅雷讲艺术》，分为傅雷小传、我听傅雷讲美术、我听傅雷讲音乐、我听傅雷讲文学、傅雷的为人、附录（傅雷学术著作）六个部分，深入浅出地向读者呈现了傅雷厚重精深的艺术造诣；李云雷的《听傅雷讲艺术》，

则围绕美术、音乐、文学以及傅雷的为人四个层面,细致挖掘了傅雷的讲学特色及其艺术欣赏心得等。此外,许钧、宋学智主编的《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傅雷译文精选与评论》,分四编探讨了傅雷的赤子之心与艺术情怀,当中更是撷取了傅雷最具代表性的十四部法文译作,包括传记、文学、艺术哲学、人生哲学等四个方面,用文学赏析与翻译研究的独特视角,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傅雷形象与独特的傅译风格。

通过上述扫描式纵览,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已有的傅雷研究,往往集中于为其著书立传,因而更多关注的是其“为人”的部分。然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的又一座里程碑”^①,学术界对于其“为译”的这一重要维度,尽管也曾给予了一贯的关注,但却留下了诸多研究空白与学术遗憾。

从翻译研究的视角来看,比较系统地对傅雷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中国学者,当推罗新璋先生与金圣华女士。罗新璋1979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读傅雷译品随感》一文,是最早的有关傅雷译作的评论性文字;金圣华的《傅译〈高老头〉的艺术》,尝试以翻译技巧与翻译方法为切入点,在详述傅雷翻译《高老头》全过程的同时,深入探索了傅雷译作的非凡艺术成就;此外,陈伟丰的《谈傅雷的翻译》一文,也是较早论及傅译特色的颇具见地的文章之一。

金圣华女士是傅雷研究专家,曾主编《傅雷与他的世界》和《江声浩荡话傅雷》。《傅雷与他的世界》由金圣华为纪念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编著,内容主要分两部分:“怀傅雷”和“评傅雷译著”,前者所选文章由傅雷的知交好友撰写;后者编收了评论傅雷译、著及其他建树的有关文章,涉及《傅雷家书》、其译著和著述及其音乐艺术评论等方面,为人们了解傅雷的思想、品格和贡献提供了客观、生动的材料。《江声浩荡话傅雷》系在《傅雷与他的世界》基础上扩编而成,以纪念傅雷逝世四十周年。该书共分四辑:第一辑“印象”包括诸多名家对故友傅雷的怀念;第二辑“影像”阐释傅雷各方面的贡献,涉及翻译成就、艺术哲学及音乐艺术观等;第三辑“影响”收入不少全新文章;第四辑“附录”列出傅雷年谱及傅雷主要译著年表。该书力图更加全面展现傅雷的胸襟、眼光、气魄与神采,尤其第三辑所收文章对傅雷的人格美、翻译观、影响力及其精神的当下意义等作了进一步剖析和较深入的挖掘。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傅雷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的展开,傅雷翻译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的视角得到了拓展,研究的内容也更为丰富。许钧主编的《傅雷的精神世界及其时代意义——“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集中展示了这一时期傅雷研究的基本状况和重要成果。

从系统的研究角度看,国内有关傅雷翻译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宋学智的《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和接受——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该书有着明确的研究目标,对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做了详细的梳理,进而就其传播的原因、艺术魅力和影响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翻译文学本体加以思考,对文学翻译的艺术品格做出界定,是一部结合傅雷文学翻译代表作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经典进行探索的理论之作。此外,近十余年来,国内外还有多篇以傅雷译本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就总体而言,国内对傅雷翻译的研究虽有发展,但还有待深入。我们意识

① 李景端:《文学翻译史的一座里程碑——怀念傅雷》,载《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第26页。

到,要对傅雷的翻译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只是从术的层面展开,应该扩大视野,从思想和文化的高度去加以把握,对傅雷翻译观、傅雷艺术观,以及傅译成就与傅译影响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书希望在目前国内有关傅雷翻译研究的学术空白处着力,以傅雷的翻译世界作为关注焦点,对其进行尝试性的系统研究,以此作为对“傅译”及“傅雷体华文风格”的最虔诚的纪念与最崇高的敬意。

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以概括式的白描手法,简明扼要地勾勒出傅雷的精神天地与文学天地,进而引领读者踏入傅雷宏大的翻译世界。第二章集中探讨傅雷的翻译诗学。尽管傅雷并未提出过“翻译诗学”的概念,但是,沿着傅雷的翻译足迹,仔细研读他的译著,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傅雷对于翻译的独到认识,对于翻译事业的强烈使命,对于读者的充分理解与尊重,以及对于翻译艺术的不懈追求,无不体现出其“翻译诗学”的精神实质。第三章围绕傅雷的翻译风格展开论证。“风格”一向是傅雷颇为重视的翻译问题,被其当作译作与原作达到“神似”的关键性因素。傅雷认为,风格的有效传达,既是译者对原作者与原文的忠实,也体现出译者对读者的负责态度,而选本、理解与表达三个环节,正是译者选择、内化与再现原作风格的过程。事实上,从语言到风格,从形似到神似,傅雷的翻译思想通过“神似论”的理论提炼渐成一个有机整体。“神似论”不仅是傅雷毕生从事文学翻译事业的自身追求与真实写照,同时它也突破了之前仅仅局限于语言转换层面的对于翻译的狭隘理解,从而引领读者进入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翻译美学的源头。第四章针对傅雷的翻译选择进行深入探讨。傅雷何以走上翻译之路?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其对翻译事业始终如一地热爱?他对自己的翻译文本,以及翻译语体,如何进行选择?而多年的译事经历,又融入了其怎样的翻译思想?事实上,我们认为,傅雷每一次的翻译选择背后,都离不开一个“真”字。“求真”是傅雷在其翻译道路上始终如一所恪守的准则。具体而言,选择翻译路途时不愿与浊世同流合污的“纯真”;选择翻译文本时“忧国忧民”的“真心”;坚持“神似论”翻译美学时所表现出的对于原作与原作者的“真实”;以及对于精神生活与艺术追求的“真挚”。事实上,“求真”即是傅雷的翻译选择之美学。第五章围绕傅雷翻译观的构筑基石——文艺思想观展开细致讨论。众所周知,傅雷不仅是一代翻译巨匠,同样还是一位文学造诣精深、艺术素养深厚的文艺批评家。那么,文艺批评家与翻译家身份的交叠,是否会在某种层面或某种程度上,使文学与艺术的因子渗入其翻译的思想观与践行观?同时,这种渗入将会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其翻译观的形成与发展?而且,这种影响是局部的、微弱的,抑或是整体的、强大的?该章尝试从傅雷的文学批评观、美术观与音乐观三个方面,探讨和叩问其文艺思想观与翻译观之间的种种张力关系。第六章在上述各章基础之上,分别以《傅雷译文集》第三卷、傅译《都尔的本堂神甫》、傅译《邦斯舅舅》、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傅译《老实人》为个案蓝本,切实深入傅雷精彩的翻译世界,探索傅译作品的恒久魅力;同时希望从这些鲜活的翻译个案中,进一步感悟傅译作品带给我们的当下启示与文化意义。

然而,在傅雷翻译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在前述六章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傅雷翻译艺术的基础之上,是否依然存在某些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继续努力和开垦的

方向的研究视角?为此,第七章辟为傅雷翻译研究之新视角,主要以某些为研究者们长期忽略的微小节点为入口,从一些相对新颖的视角切入傅雷翻译研究这一广阔领域,以此作为引玉之砖,为目前的相关研究提供某些新的思路。第八章则集中讨论傅雷及傅译的启示与意义。这里,读者不禁会问,在傅雷已然离开我们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然不懈地、虔诚地研究傅雷其人其译,以及他翻译思想的方方面面,其意义究竟何在?阅读傅雷、理解傅雷、品味傅雷,又会给我们今天的译界和读者带来哪些学术与人生启示?该章或许可以部分地解答读者的上述质询。第九章为本书的结语部分,分别从翻译思想与翻译影响两个方面,对傅雷宏富博大的翻译世界和翻译思想进行总结性概括论述。简言之,傅雷的翻译思想是“诗性”与“朴素”的辩证统一;而傅雷的翻译,犹如洁白的丰碑,永远屹立于他的每一位译文读者心中。

概言之,本书主要立足于傅雷的翻译思想、翻译精神、翻译实践与翻译影响等四个方面,在当今倡导跨文化交流的学术大背景之下,从文字、文学、文化三个互动的层面,以文化翻译的高度,围绕翻译家自身,深入探讨傅雷璀璨的翻译世界。因而,本书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思路和多重的理论追求。首先,本书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抛开惯常以时间为轴的线性传记式笔法,转而以翻译事件及翻译思想为基点,试图清晰地描述与探讨傅雷的翻译之路。其次,在文化交流与近现代翻译史的大背景之下,从“神似论”的历史渊源、文化基础、发展脉络、美学根源等层面,对傅雷翻译观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理论价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体性探究。再者,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相结合的立体研究模式,试图突破以往经验式、随感式、译文正误对比式的传统研究思路,从跨文化的高度,尽可能客观地探讨傅雷的语言观、文化观、文艺观与翻译观。最后,本书从文体学与修辞学的角度,通过傅译与原作的对比,傅译同他译的对比等视角,分析论证傅译的语言特征与风格要素,进而揭示“傅雷体华文风格”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一定意义上说,本书试图突破目前有关傅雷翻译研究的路径,尽可能拓展研究的视野,填补传统翻译研究的某些学术缺憾。

叶兆言曾经说过:“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没有了翻译家,世界文学将是一段十足的空话。没有翻译家,即使我们像伟大的歌德那样,信心百倍地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语言障碍的高山挡在面前,我们还是看不到山那边的无限风光。”^①傅雷使中国读者领略到的山那边法国文学的风光更加旖旎。正如作家陈村所言,“先生善良但远不弱小,那灿烂辉煌的死,使活着的人觉得生的暗淡”^②。傅雷的生命是永恒的,一方面源于傅雷的精神伟力,另一方面则源于洋洋大观的傅译作品。对于后者的系统研究与深入解读,无疑将有助于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与认识傅雷其人其译。

① 叶兆言:《怀念傅雷先生》,载《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第24页。

② 转引自陈思和:《傅雷的精神遗产》,载《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第22页。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 绪论：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	· 1
第一节 赤子之心，人文情怀	· 1
第二节 阅读傅雷，理解傅雷	· 3
第二章 傅雷翻译诗学论	· 7
第一节 傅雷的诗学思想	· 8
第二节 傅雷的公共意识	· 16
第三节 傅雷的读者关怀	· 21
第四节 傅雷的美学理想	· 24
第三章 傅雷翻译风格论	· 30
第一节 傅雷的语言观	· 30
第二节 傅雷的风格观	· 31
第三节 傅雷的神似论	· 33
第四章 傅雷翻译选择论	· 35
第一节 傅雷的翻译道路选择	· 35
第二节 傅雷的翻译文本选择	· 40
第三节 傅雷的翻译语体选择	· 44
第五章 傅雷文艺思想论：翻译观之构筑基石	· 54
第一节 傅雷文学批评观对翻译观的影响	· 54
第二节 傅雷美术观对翻译观的影响	· 58
第三节 傅雷音乐观对翻译观的影响	· 61
第六章 译者、读者与阅读空间：傅译之个案研究	· 70
第一节 从傅译注释看译者直接阐释的必要性 ——以《傅雷译文集》第三卷为例	· 70
第二节 从傅译对话看译者的精神与追求 ——以《都尔的本堂神甫》为例	· 76
第三节 从傅译改造看译者、读者与阅读空间 ——以《邦斯舅舅》为例	· 98

第四节 从傅译再创造看作者、译者与读者的视界融合 ——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为例	• 103
第五节 从傅译文本看傅雷的翻译诗学思想 ——以《老实人》第三章为例	• 114
第七章 傅雷翻译研究之新视角	• 124
第一节 傅译副文本研究	• 124
第二节 傅译英文作品研究	• 128
第三节 傅译“悲剧精神”研究	• 131
第八章 傅雷及傅译之启示与意义	• 140
第一节 傅译巴尔扎克的启示	• 140
第二节 傅译风格的启示	• 145
第三节 傅译的文化意义	• 158
第四节 傅雷的当下意义	• 166
第九章 结语	• 178
第一节 广博精深的翻译思想	• 178
第二节 深刻恒久的翻译影响	• 184
参考文献	• 195
附录: 阅读傅雷 理解傅雷	• 许钧 205

第一章

绪论：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

作家叶兆言在《怀念傅雷先生》一文中对于傅雷及其译作有过这样的评论：“傅雷的远去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在文化和文明缺失的昨天，他的浩瀚译著曾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一位法国学者谈到莫扎特，曾说过他的音乐不像自己的生活，更像他的灵魂。莫扎特的生活是不幸的，他的音乐却充满了欢乐。傅雷的译文也不像他的生活，他留下的文字美丽清新，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①毫无疑问，中国翻译家傅雷及其宏富的翻译世界留给了后来者太多的文化记忆。

第一节 赤子之心，人文情怀

傅雷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法国著名作家斯达埃夫人在论“翻译的精神”时说过，“人所能为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傅雷选择翻译作为其终身的事业，是因为翻译可以立命，寄托精神理想。他很早就把自己的译事与国人的自强以及民族的进步联系起来。他希望通过翻译活动振兴民族，给予国人精神上的勇力；同时，以翻译活动服务社会，推动我国的文化发展，为社会文明默默奉献。他在自己的书斋，孤独而虔诚、热情而执着地进行着这项神圣的使命。其间，他深深地体会到：“人类有史以来，理想主义者永远属于少数，也永远不会真正快乐，艺术家固然可怜，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痛苦，人类也许会变得更渺小更可悲。”由此他勉励自己：“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他深信，“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迟早得送给人间去让别人享受”。因而不断鞭策自己，竭尽所能的在尘世留下些许成绩”。即便是在被打成右派的岁月里，傅雷也没

^① 叶兆言：《怀念傅雷先生》，载《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第26页。

有忘记以沟通东、西文化为己任,并且依然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思考东、西文化的问题:“东方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士,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他依旧把“为人类共同的事业——文明,出一分力,尽一分责任”,视为自己和他人的共同追求。这种崇高的境界,更彰显了其云水襟怀的一颗赤子之心。

傅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同时,感情的纯洁与真诚以及大写的爱,铸就了傅雷生命的本真。在傅雷的生命旅程中,无论是对他人、社会、民族或者国家,他都让我们看到了一片赤子之心:他崇尚希腊精神,把纯洁视为“古典精神的理想之一”,用水晶一般透明的心对待他人,成为“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他追求“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在热心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真诚到甘做他人和社会的诤友;而他的爱心,也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全然得以呈现:“弟虽身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爱党爱友之心亦复始终如一。”作为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一名典型代表,傅雷的赤子之心不仅表现在,把自我置于民族进步与社会发展中寻求自身的人生境界,还表现在,把自我高格调的生命追求与高品位的艺术追求完好地结合为一体。因而,他的赤子之心蕴涵丰富,具有非凡的感人力量。

傅雷的心灵是纯洁的,纯洁的心灵因为崇尚真而愈显美丽。傅雷曾说:“只有真正纯洁的心灵才能保证艺术的纯洁”。他“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无法容忍一丝一毫对艺术的玷污行径。他对傅聪说过:“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不是纯洁到像明镜一般,怎么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怎能打动听众的心灵?”傅雷认为,“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因为只有拥有了真诚,才会拥有虚心,而唯有拥有了虚心,才能够真正有所感悟,进而对作家深入体会。傅雷所注重的真诚,不单单是指艺术家需要怀揣一颗真心从事艺术事业,更是指艺术家需要在艺术道路上保有求真、爱真、守真的意识。正是秉承着这样的艺术信念与艺术追求,傅雷的译文才不仅流露出“美”,同时还流露出“真”——做人的“真”与对原著的“真”。正如傅敏所认为的,“真”是傅雷“最大的特点”。

与此同时,傅雷还拥有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他期望通过文学翻译活动来服务民众,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此实现自己在社会价值方面的责任心。而这其中,也正包含了傅雷本人对于艺术的热爱,以及对于文学翻译工作的真诚的、热烈的、忘我的爱。赤子之心与人文情怀,是傅雷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叠合;而此二者的叠合、交融、凝结,更产生了巨大的动力源泉,使其对艺术的爱更为炽烈,对文学翻译也更加

情有独钟。因为,他已然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融合在具体的艺术追求当中,而就翻译层面而言,“对文学作品爱之愈切,领悟愈深;领悟愈深,译者与作者愈能发生思想的接合和心灵深处的共鸣,译者也就愈能传达出作品的‘神韵’”。所以,傅雷的译著至今还能赢得“许多心灵的朋友”,与他们“相接相契相抱”,这与其融合了人生理想与艺术理想的赤子之心与人文情怀,不能不说着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有着一颗超凡脱俗的赤子之心,傅雷才能够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之中,充分调动起自身的艺术热情和文学才华,忘我地投入,并且最终把自己的人品融化在译品当中,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连同着艺术心血,一道化作极富魅力的感人文字,变幻出深刻的人文情怀以及永恒的生命力量。

傅雷虽然走了,但是他的赤子之心、人文情怀,他对于生命的独特诠释、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使得他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存在,并将永远地存在下去。

第二节 阅读傅雷,理解傅雷

2006年9月25日,“江声浩荡话傅雷——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在其家乡上海南汇区召开。该次会议上,许钧作了主旨发言,说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他而言是一部书,一部普通的书。因为那时他只知道傅雷是个做翻译的,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等外国文学作品很好读、很有意思。但他记住的只是傅雷译的书,记住的是作者的名字,很少想到翻译这些书的傅雷这个人。在许钧四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他而言,是一棵树,一棵常青树。因为研究翻译,他知道了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是翻译使原作的生命在异域、在异国的文化土壤中得到了延伸与传承。由此而联想到傅雷,傅雷和罗曼·罗兰,可谓是一段历史的奇缘。如果没有傅雷,罗曼·罗兰在中国或许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知音;正是因为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拥有了新的生命,获得了如同本雅明所言的“来生”;也正是因为傅雷这棵译界的常青树,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一批法国文学家的文学生命,才得以在中国延续。

借助傅雷的译著,许钧开始关注站在书后的那个人,关注赋予了原著生命的那个翻译家傅雷,并逐渐懂得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更是一种思想的迁移与传播、文化的跨越与交流。于是当许钧成长到五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他而言,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姨》《高龙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也不再是简单地赋予了原作生命、使原作生命在中国得以延续的译界常青树;傅雷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围绕着傅雷这个人,许钧的脑海里时常盘旋着一个个问题:

何为翻译？为何翻译？翻译何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会如此专注于翻译？他的翻译到底带给了中国以及中国的读者什么？

同样是在“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上，哲学家郑涌谈到，我们如果仅仅从翻译与艺术的角度去评价傅雷是不够的，因为傅雷不仅仅是翻译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他传播的是思想的圣火，他是“思想圣火传播者永远的榜样”。八十八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先生是傅雷生前的好友，他也认为，我们对于傅雷，关注其翻译的技术层面比较多，但实际上，傅雷是个“文艺家、翻译家”，还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要理解傅雷，研究傅雷，就必须研究傅雷这个人，研究傅雷所处的时代，研究傅雷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从他们的话中，我们感觉到，从对傅雷译著的关注到对傅雷思想的关注，直至对傅雷这个人的关注，恰恰可以构成接近傅雷、理解傅雷的不同途径。

阅读傅雷，是理解傅雷的基础。傅雷的书，我们读过很多，包括他的全部译作以及他的家书。而在参加“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期间，我们也有幸读到了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傅雷文集·文艺卷》，其中收录了傅雷的“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著译序跋”“政治杂评”“美术论著”和“音乐论著”。近来又研读文集，也许是职业的缘故，我们再一次联想到与傅雷翻译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傅雷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翻译？在傅雷文集中，在傅雷为其译作所写的序言、前言、附识中，我们可以找到傅雷本人对于上述问题的相关解答。而一言以蔽之，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的意义是多重的。

首先，在黑暗的岁月中，傅雷试图借助翻译，寻找光明。1931年，从法国归国的傅雷满腔抱负，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但是，性格刚直、愤世嫉俗的他，委实难于融入那个“阴霾”遮顶的黑暗社会，于是只得闭门译书，献身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事业。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正处于“九一八”事变、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傅雷有感于当时许多中国人“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的状态，陆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即《巨人三传》。1934年3月3日，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表达了其翻译的初衷：“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们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发”；“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傅雷，2006a：462—464）。鉴于此番经历，傅雷曾发誓翻译此三传，期望能够对身陷苦闷之中的年轻朋友有所助益，帮助他们从中汲取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勇气和信心。

正是在这种对于光明的渴望与寻求中,傅雷和罗曼·罗兰达成了精神上的契合。他从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发现了人类得以生存的最基本元素——爱,以及当时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英雄主义。于是,他投入了更大的热忱,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这部伟大作品。在译著的卷首部分,附有原作者的《原序》,借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傅雷将这部“贝多芬式的”大交响乐呈现给中国读者时的意愿:“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不顾一切的去生活,去爱!”^①从中不难发现,傅雷希望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激起人们对于世界的爱,对于人生的爱,乃至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爱。

其次,在举国惶惶、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灾难的危急时刻,傅雷期冀借助翻译,为颓丧的国人点燃希望。他在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前言中写道:“在此风云变幻,举国惶惶之秋,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能为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傅雷,2006b:206)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绝不是针对语言技巧的玩弄,也不是有关西方智识的贩卖,更不是赚钱营生的手段,而是点燃人们心头曙光的火种。

再次,当“现实的枷锁”重压着人生、国人在苦恼的深渊中挣扎之时,傅雷则又一次寄希望于翻译,试图借助翻译之力为痛苦的心灵打开通往自由的道路。他选择翻译罗素的《幸福之路》,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在译者前言中,傅雷写道:“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压抑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那末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去一尝人生的果实,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他有感于“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的突兀;有时内心的阴霾和雷电,比外界的更可怕更致命。所以我们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重保障”(傅雷,2006b:209)。由此可见,他翻译《幸福之路》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希望该书起到精神向导的作用,给彷徨于歧路的国人指一条路,给脆弱的心灵以保护,给禁锢的灵魂以自由。

此外,解放后,傅雷主要着力于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这其中既包含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不乏其自身的主动追求。傅雷翻译巴尔扎克,是希望彼时善恶颠倒、是非不辨、美丑不分的世界,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在《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的简介中,傅雷曾如是说明:“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

①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原序》,傅雷译,见傅雷译:《傅雷译文集》(第七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

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对比;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令人读后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唯其如此,我们才体会到《人间喜剧》的深刻的意义。”(傅雷, 2006b: 221)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傅雷翻译的意义,从而明晰认识傅雷的翻译之路,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确立今时今日之翻译目标,即,为输入优秀的外国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拓展我国读者的视野,振兴中华民族而做出贡献。唯有立足于此来研究傅雷的翻译,我们才有可能超越文字和文学的表层,真正触摸到傅雷的翻译以及傅雷精神的本质。本书将围绕傅雷的翻译诗学、傅雷的翻译选择、傅雷的文艺美学、傅雷的启示及意义等问题,深入探索傅雷翻译背后所潜藏的文化与思想意义,并逐层揭开傅雷的生命价值之所在。

第二章

傅雷翻译诗学论

据考,“翻译诗学”一词,最早由法国已故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翻译理论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在其1973年版的《诗学(卷二):创作认识论和翻译诗学》中提出。在该部著作中,梅肖尼克尝试性地提出建立一种“翻译诗学”的构想和原则。梅肖尼克提出“翻译诗学”的初衷,在于其认识到“对文本的翻译如同对文本的写作活动本身一样,是一种超越语言之上的活动,它不能用陈述语言学也不能用雅各布森形式诗学的理论进行描述”^①,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对此加以陈述。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一种关于文本翻译的理论被包含在诗学中,而后者是关于文本价值及其意蕴的理论”^②。根据梅肖尼克的构想,“翻译诗学”是一门借鉴诗学理论研究文学翻译过程的学说,这一学说的核心内涵在于,强调“翻译不再被视作将出发语文本搬移至目的语文学的活动,或者反之,将目的语读者搬移至出发语文本前的活动(这一双重运动建立在意义和形式的二元对立之上,后者经验性地表现了大多数翻译的特征),而是被视作一种在语言中进行的工作,是中心偏移,是价值与意蕴之间的诗学关系”^③。也就是说,翻译活动,至少文学翻译活动,并不是简单地将使用源语写作的文本用目的语重新叙述一遍,也不是字字对应地将源语文本翻译成目的语文本,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创造性地再现原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是通过语言的转换实现的,但它最终的目的却是要摆脱语言,实现原作的价值和意蕴在译作中的再生。从“翻译诗学”的角度来说,这“价值”和“意蕴”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作品的特殊性,梅肖尼克称之为作品的“节奏”,即作品的意义的特殊组织方式。

尽管傅雷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过“翻译诗学”的术语,但是,沿着傅雷的翻译足迹,仔细研究他的译著,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傅雷对于翻译的独到认识,对于翻译事业的强烈使命感,对于读者的充分理解与尊重,以及对于翻译艺术的不懈追求,无

① Henri Meschonnic: *Pour la poétique II: Epistémologie de l'écritur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73: 306.

② 同上,305—306。

③ 同上,313—314。